

# 阅读和研究《文选》 所不能忘记的

■ 戴燕

尽管文学在中古时期强劲生长,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可是仍然未能脱离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文学往往是有关政治的一种“文学性”表达。



▲《上林羽猎图卷》(局部),传元人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按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说法,自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凡四学并建”,文学始特立一科,文学就开始“别于众学”了,那么一个甲子后,隋文帝主持编辑《文选》,刻意摒弃“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专门选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赋诗等文字,也应该算是在“文学别于众学”的潮流中。

说“文学别于众学”,这里的文学,指文章之学,相当于后来说的辞章、今天说的文学表达。文章之为体裁,则有《文选》所说赋诗、诏册、书序、颂赞等三十多种,都与经、子、史书不同,因为有了独特的形式与价值,它们也被当成需要通过学习、模仿才能够掌握的写作技能和知识体系,自宋文帝以后,被纳入王朝的文化学术体制。

由铃木虎雄在1920年前后提出的魏之“文学自觉”说以及刘师培在同时期发表的这一“文学别于众学”说,是中古文学研究过去最为大家熟悉的理论,它们大大提升了中古文学的地位,也为中古文学研究框定了方向。但是在近年阅读《文选》的过程中,我却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尽管文学在中古时期强劲生长,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可是仍然未能脱离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文学往往是有关政治的一种“文学性”表达。这在《文选》中有很多迹象,例如它收录了相当不少的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和弹事、奏记,就都是些政令政策以及政治事务相关的文件。

除去极其明显的这一点,让我再来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是屈原。**屈原大概是《文选》收录年代最早的作家,“骚”类选有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另有贾谊的《吊屈原文》。屈原之《祭屈原文》,《文选序》又提及《史记》引到而《文选》未收的《九章·怀沙》,称“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抑郁之怀靡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据《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本来是战国楚怀王和楚襄王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入则与王图议国

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却因为与楚王政见不同,被流放,行吟泽畔,写下《怀沙》。在《怀沙》中,屈原自认为是“内厚质正”的君子,却在黑白颠倒、玉石杂糅的现实世界遭人攻击,因此只能选择与世界隔绝,独善其身,而这也并非是他本性。只因他心中有一个理想世界,那是在舜、禹、汤的时代,这个理想世界不会再出现,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有是非对错之分,是非对错不分,则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决定自沉以为最后的抗争。

《文选序》便是接受了屈原在《怀沙》中表达的关于他自己、他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断定屈原是“含忠履洁”而又“深思远虑”的。所谓忠、洁,当然是对屈原政治道德的评价,说明《文选》的确是屈原的作品看成一种政治表达,不仅如此,又还视之为“骚人之文”的首创。

“骚人”指的是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人,“骚”取自《离骚》,是忧的意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史臣曰”中讲述从“周室既衰”屈原、宋玉至于晋宋间谢灵运、颜延年的这一段文学历史,称玄黄律吕、宫羽同祖《风》《骚》,称玄黄律吕、宫羽同祖《风》《骚》,称玄黄律吕、宫羽同祖这套理论也是“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他所谓“骚人”,便是指屈原。《文选序》说“骚人之文,自兹而作”,也便是沿用了沈约的说法,意思是自从屈原以来,文学就成为一种政治理想、政治见解和政治危机意识的表达。

所以读屈原的作品,不能不看到它们其实是一种政治诉求。

**接下来看看司马相如。**《文选序》引《诗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如果按照唐六臣注张铣注“歌事曰风,布义曰赋,取类曰比,感物曰兴,政事曰雅,成功曰颂”,那么,六义即六种写作方法都非纯粹抒情,都是功能性的,都关乎政治。而《文选序》又说荀卿、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之赋都是继承了古诗,“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政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鸟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也就是说无论拓展到何种题材,他们都还是在用关乎政治的诗的笔法和诗的精神写赋。《文选》选入司马相如的文章,于赋有《子虚》《上林》等,还有《上书谏猎》《喻巴蜀檄》

《难蜀父老》《封禅文》,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比较,只少了《大人赋》《哀二世赋》,多了一篇《长门赋》。

而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便可知,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到武帝时期写作《子虚赋》《上林赋》,其实是有着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他曾在阻止七国之乱有功的梁孝王那里跟枚乘等人学写赋,也学到了枚乘在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护天子的立场,由才以赋的形式,就齐之海滨、楚之云梦和天子山林苑作对海性的描写,用语言来呈现,构造天子与诸侯间的等级关系,强调诸侯必须有自知之明,不可图谋专制,这既是对汉帝国写的想象,因而“赋奏,天子以为郎”。

可是几年后,唐蒙到巴蜀征调吏卒以通夜郎,在当地引起骚乱,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做紧急处理,司马相如便写下《喻巴蜀檄》,代唐蒙及地方官道歉,但他的重点却是在训斥巴蜀民,要他们“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这当然是站在朝廷立场。问题是在巴蜀期间,他也听到当地人抱怨通西南夷得不偿失,并非良策,而为了让决策者了解实际情况,他又忍不住写了《难蜀父老》,委婉表达应该用羁縻的办法对待“夷狄”的意见,这次他丢了郎官。

司马相如临死前写下《封禅书》,对汉武帝八年后登嵩山、巡行海上,然后登泰山封禅,据说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还有蜀地学者称赞他“制礼造乐,移风俗”,地位超过董仲舒,仿佛“孔子大齐桓之霸”。

所以通过《文选》中司马相如的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到文学始终是在为现实政治而书写、制造。

**再看一例,陶渊明。**《文选》收入陶渊明的诗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八首,还有辞《归去来并序》一首,又有颜延年的《陶征士诔》。从现存陶集看,这只是陶渊明的一小部分作品,但萧统编过《陶渊明集》,他读过的陶渊明作品一定更多,比如他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闲情赋》就没有收在《文选》内。

萧统对陶渊明评价很高,在《陶渊明集序》里,他说到陶渊明在写作上是有其独特之处:“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但他更强调陶渊明作品的思想价值:“尝谓有能读渊明之

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所谓有助于风教,便是指能陶冶性情、改善社会风气,在萧统看来,这才是陶渊明的意义所在。

而要理解这一点,势必要将陶渊明放到汉代以来的隐逸文化传统里面。隐逸是一种文化,在汉宋之间,尤其是一种政治文化,关系到士人对于朝廷政治的立场和态度。正如沈约写陶潜传,是放在《宋书·隐逸传》中,视陶渊明为隐士,但这又并不是沈约自作主张给陶渊明的定性,更早与陶渊明有过交往的颜延年在写《陶征士诔》时,就已经说到陶渊明仿佛尧时的巢父、伯成子高以及殷周之际的伯夷、秦汉之间的四皓,死后也将与战国时的黔娄和春秋时的展禽(柳下惠)归于同一世界。颜延年提到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是不愿处朝廷而宁为山林之士或是不肯接受新朝的,颜延之认为他们在有气节、讲操守方面,比尧、禹更值得尊敬,也与周朝汉室同样伟大,他是用这些历史人物来比况陶渊明的处境、认同乃至个性,以此认定陶渊明的价值。萧统正是接受了颜延年以来的影响,不但说陶渊明在文章中谈论时事很坦率,讲述内心很真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又还说陶渊明为人讲原则、不苟且,安贫乐道,值得钦佩:“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所以读陶渊明的作品,势必也要能透过他笔下的酒和田园,看到那其实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政治表达。

我想用上述三个例子,说明在主张文学独立的《文选》编者这里,所谓文学的价值也在于它为一种政治表达,有政治意义,这是阅读和研究《文选》所不能忘记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学林

【编者按】

“铁笔丹华——谢嘉明、方介堪、徐无闻篆刻艺术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三位先生的代表作品和珍贵文献,集中呈现他们的艺术造诣和学术观念。展期至2024年1月3日。  
谢嘉明(1884—1963)、方介堪(1901—1987)、徐无闻(1931—1993)之间师承授受、承先继后,可明显看到20世纪篆刻艺术与学术的传承递嬗、环磨切磋。他们的艺术作品也洋溢着浓厚的学者气息。

徐无闻先生于铁笔艺术用力之深且久,不逊柔翰八法。而其最得力处,技法之外,实赖文史之积学、书法之功。就古文字一端论,先生曾任《汉语大字典》字形组长,襄助徐中舒先生成《古文字字形表》,又主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等多种传世,数十年后重印,学界称快。先生于古文字书法,先殿墟书契,后中山三鼎,书契渊穆,中山瑰逸,人每见之,辄辄为怀。然浸淫最久,传世较多,特具自家面目者,当推玉箸小篆乎。玉箸起自李斯,接踵武者为李阳冰。阳冰玉箸独步当时,自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真非虚言。而不知后千二百年有先生出,非唯结构之优美,运笔之悠游,笔力之沉雄,品韵之高雅,超二李而上之,观其一再自篆“徐氏玉箸”,矜于作品,自得之情,又岂输阳冰哉!

先生曾著文论篆刻之关键在篆,无论白文朱文,一字多字,每治一印,伊若起一棧,必先经日构思,精意设计,纸上打稿,反复修改,故一印时有至数稿、十数稿者。稿定然后上石,上石复作微调,白文则墨迹刻尽而不伤石,朱文则唯留墨痕而石面尽去,依稿奏刀,印成钤出,对观墨稿,几无参差,此癸亥岁(1983)暑假,余寓先生府上之所亲见者也。

先生治印,上自战国秦汉,下至当代前贤,多方取挹,面目遂丰。古玺如老端端坐,半通有闰秀之姿;满白浑茫,元朱明润;鸟虫婉而茂,凿印质而文。小若米粒者窃妙,广逾数寸者雄强;不拒金石之气,尤重有墨有笔。若寻其一以贯之之处,欧阳文忠公“蔚然深秀”一语,庶几近之乎?先生本为大书家,五体书法罔所不精,故乐借边款一展长技,不唯内容丰富多彩,文辞雅雅,字体之多样,刀法之多变,更为并世印坛所不多见。

先生幼承庭训,书法篆刻得其尊人益生翁开蒙,志学之年幸识潜江易均室相翁,授之印学史;又叩成都周菊吾先生门请业,深蒙教诲;而立甫度,经相翁之介拜嘉方介堪先生为师,书信往还,时相请益,经岁积年,又专赴嘉嘉补行拜师之礼。鄞县沙孟海先生致书先生,谓虽任西泠社长,并不过问人事,唯敬介二人入社云云,二人者,先生与蒋维崧先生是也,此书札亦余四十年前幸所亲睹者。又癸酉(1993)暮春,先生信,意甚欣然,然谓正在病中,愈即复信,孰料竟尔一病不起。余后登小红楼,出先生信以示元白翁,翁默然摇首,沉吟久之。彼情彼景,如在昨日。

先生曾谓桐乡钱君甸先生艺林尊宿,“即以篆刻一端,已可不朽”。以此语反诸先生,孰谓不可。先生逝后二年,故旧门生齐聚成都探讨先生之学

# 「其学识有所不同也」 ——徐无闻先生的篆刻

刘石



▲徐无闻曾长期执教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艺,细思先生之品格,先生同门弟韩天衡先生即以“无闻不朽”四字榜书致意。先生逝后三十年,其书法篆刻更广为世人所敬仰与追慕,先生真不朽矣!

谢嘉明、方介堪、徐无闻三先生造为师承,好尚略同,追求差几,堪为精微典雅印风之杰出代表。昔年元白翁序《徐无闻论文集》云:“印学自邓完白、吴让之以下日趋于蹙,更下至晚近画搜相稍尚。虽时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铭功铸印示信之法,则荡然无复遗存。先生篆书不减王虚舟、钱十兰,而治印则远绍吾子行,近迈王福庵,其学识有所不同也。”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杜鹏飞君攀划三代师展,意欲为吾国篆刻艺术之正脉张目,别有深意存焉。又以此受教先生有年,命余撰文,此皆余所感激赞叹者也,故书所知所感如上。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老子其犹龙邪」



► 行云流水



# 开枝散叶:域外媒介中的老子

■ 周勤勤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祖师,与孔子一样,是上古王官学的整理者、阐释者和发扬者。其思想以“道”“德”“善”等为核心,倡导“涤除玄览”“知白守黑”“上善若水”“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饱藏着关乎宇宙、自然、政治、人生、教化之深邃哲理,透显着明辩的辩证法思维。道家与儒家思想一道,一主坤阴一主乾阳,一主消解一主建构,深刻影响了历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趣和行为举止。老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亦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世界的学术瑰宝,具有充实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化解人与自然之矛盾、推动多元文明和谐共处等价值。

对于老子思想的域外传播,有历史记载的《老子》译本最早出现于唐朝,是梵文译本。目前译本虽已失传,但翻译过程的记录还有留存。比如,如何翻译“道”。玄奘和道士们就进行过讨论,玄奘建议用“末伽”(Marga)即“路径、方法、解脱道”的意思,而成玄奘等道士主张用更具超越意义的“菩提”(Bodhi)。

最后,选用“末伽”作为“道”的翻译。《老子》在西方的销量之大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歌集子,而译本的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

武志勇、甘葆蓓的新著《老子思想域外传播研究》专研已成“庞然大物”的老学在世界范围的开枝散叶。作者首先介绍域外书籍这一媒介空间中老子著作与思想的传播。在一般所关注的老子思想对日本、欧美地区的影响之外,作者还探讨了其在印度、泰国、越南、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同时关注到老子思想在除学者以外的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即域外新闻报刊和网络、影视媒介空间、社交网络媒介空间、域外知识网络媒介空间——如海外重要

报刊,非虚构影视作品,以及陶书、域外社群、维基百科中的老子思想,可谓别具视野。

书中还给出了媒介空间视域下,未来推动老子思想域外传播的基本策略,即重视现实层面老子思想与著作传播的共通与拓展,重视学术研究层面老子思想与著作传播的共享与丰富。书后附有《罗维前、森树渊教授谈老子思想域外传播及其现实意义》,以及《〈道德经〉域外翻译和出版译者、出版时间、出版地、出版语种一览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作者立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环境,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历史研究法,梳理分析了老子著作与思想

的翻译出版情况,探讨了其在书籍媒介空间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状况与历史经验。此外,作者以美国、英国、新加坡等30余个国家的近300家报刊和海外网络媒体对老子思想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内容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并使用数据处理工具,对1134条主流报刊报道数据和19658条网络数据深入分析,从而呈现出老子思想在域外媒体中的传播图景。在影视传播部分,作者则从政治霸权、影视市场逻辑以及文化壁垒等三个方面着手,分析老子和《道德经》在海外非虚构影视作品中的缺失及其原因。而在社交网络媒介部分,作者以电子书上26个英文群组为研

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与个案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探究老子文化网络社群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形成、运作以及传播机制。

翻译学的一般理论也被运用其中。书中介绍了老子著作在全球的译介状况,探讨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因翻译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跨语言理解上的问题。作者以文化趣味群体概念、身份共同体理论、组织形态理论,以及传播学的一般理论,对老子思想在新闻报刊、网络的传播规律及社交媒介中的传播情况作了分析。书中还启用了源于20世纪中期的环境戏剧理论,探讨维基百科中的老子思想。

本书得出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

意的成果。如在研究老子思想在域外新闻报刊和网络媒体中的传播时,作者发现,数十年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联合早报》《悉尼先驱晨报》等报刊对老子思想的关注度呈上升趋势。报道灵活运用通讯、评论等体裁和引述、预设、对比等表达策略,以肯定或中立的态度重点诠释了老子“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少私寡欲”“柔弱不争”等思想。多数报道习惯将文本语境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交融,影响海外受众对老子思想乃至中国的认知……

总之,《老子思想域外传播研究》一书,充分展示了老子思想的价值,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代甚至将来,老子思想依然会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史怀哲曾言,康德、黑格尔是西方思想的巨人,而老子则是人类思想的巨人。探讨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老子,将持续给人类思想带来巨大的洗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教授)